

如果爱因斯坦不是一个出色的小提琴手，他能够创立相对论吗？如果他不曾醉心于音乐的和谐，他能大胆地追求时空的和谐吗？光速不变和条件不依赖于坐标系，这两个原理简明而又完美，不正像贯穿在宇宙奏鸣曲中的第一主题和第二主题吗？

“原子弹之父”为什么恰巧是古典文学的酷爱者？莫不是奥本海默从普罗米修斯那里领受了启示，要把巨大的能源偷来人间？或者，他也象浮士德一样想与魔鬼打打交道？如果他的浪漫气质没有达到自由奔放的境界，他是否能够承担起命运的委托，完成千秋的伟业？

科技创新仅仅要求人们积累知识和训练思维吗？还是也要求对于生活的领悟和对于美好的追求呢？也许，“科学的想象力”或“科学灵感”要插上艺术的翅膀才能自由飞翔吧？也许，“科学的鉴赏力”或“科学造诣”要经过艺术的锤炼才能炉火纯青吧？

有些人不以为然。

要不，《驯火记》的作者为什么去塑造一个

安法然——了不懂艺术，没有爱情却缔造了宇宙火箭的“书呆子”？为什么有些自称为先进的作家要把科学工作描绘得森严可畏，冷气袭人？（大多数生活中的科学家远之不是那样子！）是因为作者自己想垄断维纳斯吗？还是出于嫉妒而企图阻挠热爱生活的年轻人投身科学呢？为什么他们对于青春梦幻、人世悲欢总是喋若寒蝉？为什么对于心灵艺术、天地情长徒之琵琶遮面？

我无保留地相信陈景润是一个寡欲到近于怪癖的伟大数学家，而且我尊敬他的专一；这正如我十分相信古代有一个农夫在树下捡到了一只撞死的野兔一样，而且我羡慕农夫的幸运。

但是，一个民族想要进入科学时代，能不能只等待献身者的努力？那个农夫想要富裕起来，能不能指望“守株待兔”？

能不能在贫瘠的艺术土壤上长出茂盛的科学森林而不是几棵孤苗？能不能封闭艺术的灵柩而呼吁科学的创制？（能不能不给千里马吃草？能不能只要第二层楼房？）

七九年二月